學術討論

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臺灣(1985–1995)

顧燕翎*

一、前言

婦女研究（以下簡稱「婦研」）或女性學之成為學術領域是世界第二波婦運在七〇年代後期的產物，最早發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當婦運激發了新的思考向度，而大學和研究所女生在傳統學域中苦求答案不得，開始自組課程，便由下而上地推動了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思辨，在積累相當成果後，成立了新的課程、學系和研究領域（顧燕翎 1986: 61–64）。婦女研究 / 女性學之不同於傳統學域之處在其女性立場、女性主義理論、突破傳統學域區隔之認知方法、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為主體的研究方法以及女性主義實踐精神（Bowels and Klein 1983; Harding 1987; Reinharz 1992）。「婦女研究」做為一個學術範疇的概念在八〇年代中期引進國內，本文欲從一個婦運和婦研實際參與者的角度來探討：這樣一個新生的女性主義的學術領域是如何、在何種社會條件下引入的；它以何種方式適應本地學術

* 國立交通大學共同科教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生態和社會環境；如何取得社會資源、以何種組織型態生存、與既存學術體制和婦運關係為何；曾引發過那些知識論和方法學的爭議，亦即婦女研究在臺灣的建制過程 (histor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①

以世界性眼光來看，七〇年代以前，學術界雖然不乏零星的、以女性為對象的研究，婦女研究或女性學這類名詞或這種學科類別卻根本不存在，因此婦研成為可見的、獨立的學術領域有其特殊的歷史的和知識論的意義，它的特殊性在其政治化性別角度 (politicize gender) 的研究，換言之，婦女研究不只站在女性立場對社會文化現象提出解釋，而且懷有改造性別關係的終極政治（廣義的）目的。不過，即使研究者在無性別政治意識下所做的有關婦女的研究，亦不無被政治化的可能，任何呈現婦女在社會文化情境中弱勢處境的研究都有可能因為揭露了性別權力差距的社會現實而強化了婦運論述，而變得可以為婦女所用。為了便於在較長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臺灣婦女研究的發展過程，本文將以 1985 年以前所有以婦女或女性相關議題為對象的研究做為背景資料（當時未曾舉行過婦研會議），放在本地婦運的進程中，② 檢驗其階段性的發展及特色，以便與「婦女研究」做一對照：一、婦運前（1972 以前），當時任何形式有關婦女的研究都極為稀少；二、第一波婦運 (1972–1981)，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逐漸引進，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數量顯著增加；三、第二波婦運 (1982–1993)，隨著西方，特別是美國，婦女研究的興起，相關研究在臺灣不僅數量劇增，也進入學術體制——婦女研究會議及機構相繼出現，但旋即引發婦女研究應否採用女性主義觀點的論辯，造成婦研定義的首次公開爭論；四、第三波婦運（1993 以後），婦研與婦運的關聯較為確立，本地學者較為接納女性主義，婦女研究也漸揚棄以婦女為對象的「客觀」研究，轉變為以女性為

① 有關婦研建制史的討論通常亦包含課程的開設和博碩士論文的質量，但因本文篇幅有限，且資料不全，加以授課者對婦研定義歧異過大，在同一課名之下，可能出現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截然相反的論點，故暫不討論。此外，女性主義對傳統學科亦產生重大影響，各學科內的婦研亦非本文重點。

② 本文採取的婦運定義為有意識、有組織地提倡女性意識和女性主義的言論與行動。第一波婦運以呂秀蓮創導新女性為始，第二波則起自婦女新知之成立，第三波為女性學學會之組成，有關臺灣婦運之研究以及分期，請參閱顧燕翎 (1987)，梁雙蓮、顧燕翎 (1995)，李元貞 (1989)。

主體的自覺性研究。由於第三階段為臺灣婦研重要的奠基期，也是婦研界逐漸建立共識的轉型時期，因此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二、婦運前（1972 以前）

1972 年以前，有關婦女的研究數量極少，根據婦女研究室 1990 年出版的臺灣婦女研究文獻目錄，在總共 1669 則研究（包括書籍與論文）中，僅有 150 則發表於 1900 年至1971 年之間，按照婦研室的分類，其中一半以上處理的是婚姻與家庭以及婦女的法律地位，其他則分散於人口、經濟與工作、心理和教育，多半的研究都是將婦女置於傳統性別角色之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 150 則研究中，至少有18 則討論當時較為特殊的社會現象——養女和童養媳的問題。

此期有關婦女之研究集中在傳統學術領域內，以人類學及歷史學為例，人類學家 Margery Wolf 和歷史學者鮑家麟，都分別在各自領域之內，進行對本地農村婦女或中國歷史上男女平等思想的研究，她們雖未在作品內標明女性主義，卻創先透過女性的觀點，對資料進行分析，對後學者深具啟發性，因此至今仍一再被引用。在婦研室所蒐集的學術著作之外，我們尚可發現五〇年代初期的國民黨刊物《中華婦女》刊有一些有關女權、婦運的論述，其後該刊的言論則無異於其他婦女刊物，肯定傳統性別分工以及婦女在家庭內外的輔佐地位。

三、第一波婦運 (1972–1981)

七〇年代有不少婦運先進從事女性主義思想的引介，1972 年晨鐘出版社出版了歐陽子等人翻譯的女性主義巨著《第二性》（缺第一卷理論部分），1975 年再出版了楊美惠的《婦女問題新論》，其中簡要介紹了葛瑞爾 (Germaine Greer) 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米德 (Margaret Mead) 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波娃 (Simone de Beau-

voir) 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等等。呂秀蓮所主持的拓荒者出版社也在 1976 年之內出版（包括翻譯）了 15 本與婦女相關的著作，其中有她自己的《新女性主義》，這是最早的本土婦運理論性著作。

同一時期，婦研文獻的數量也明顯增加，除了受惠於社會轉型 —— 經濟成長、教育發達、研究風氣漸盛之外，國內外婦女運動的興起亦激發了研究和創新理論的需要，《臺灣婦女研究文獻》在 1972 至 1981 十年之內，就蒐集了 558 則研究，其重點雖仍是在探討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之內的人口（ 92 則）、經濟與工作（ 70 則）以及婚姻與家庭（ 62 則）問題，不過已逐漸出現工作場所性別歧視的討論，在家庭研究中也開始關注到親子關係。而新添加的研究項目則遍及婦女參政和語言、宗教、媒體等方面。歷史學家李又寧和張玉法於 1976 年主編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79 年鮑家麟主編的《中國婦女史論集》和李又寧、張玉法在 1981 年合編的《中國婦女史論文集》，都提供了婦研豐富的史料。

四、第二波婦運 (1982–1992)

第一波婦運因種種因素未能持久，經過一段沉寂，新的婦運團體婦女新知（以下簡稱「新知」）在李元貞推促下以雜誌社形式於 1982 年成立，繼續譯介西方女性主義思想③ 、探討中國婦女史、檢討現行法律與政策並提出修正方案，同時提供當時被主流言論機構拒斥的女性主義論述一個言論空間。 1987 年解嚴以後，婦運衍生出來的諸多單一議題團體相繼成立，如晚晴協會、主婦聯盟、婦女救援會等，各團體以共同議題互相聲援而將之提升為公共政治論述，如制定〈男女平等工作權法草案〉，進行〈民法親屬篇〉的修訂等等。 1991 年婦女新知在極艱困的條件下出版了世界第一本《女書》，試圖保存這獨一無二的女性文字和女性書寫。

③ 在 1982 至 1987 年間，婦女新知先後介紹了彌爾 (John S. Mill) 的*The Subj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Mary Wollstonecraft 的*A Vindication on the Rights of Woman,* Virginia Woolf 的*A Room of One's Own*, Jean B. Miller 的*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除了國內的婦運，1976 至 1985 年也是聯合國明定的「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在此十年中，聯合國分別在哥本哈根、墨西哥市和奈羅比舉辦了 3 次世界婦女大會，並通過了〈消除所有形式對婦女歧視法案〉(The U. N. 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如他國婦女直接享受世界婦運的成果，卻也受惠於全球女性意識的提升和婦女研究的興盛，在美國亞洲協會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支援下，於 1985 年以後陸續出現了跨領域的婦女研究會議和婦女研究機構，其中亞協尤其扮演了催生者的關鍵角色。

㈠婦女研究會議

1985 年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前後，「婦女研究」這個名詞傳入國內，④ 在美國亞洲協會（以下簡稱亞協）的建議（參閱張玨 1992: 29）和贊助之下，臺大人口研究中心（姜蘭虹教授）在當年首先舉辦了國內第一場婦女研究會議「婦女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研討會」，接下來東吳大學（林蕙瑛教授）和基督教長老會（廖碧英女士）也在國際教會團體支援下，分別主辦了國際性的「亞洲婦女之未來研討會」、「亞洲婦女大會：觀光與賣春」。「觀光與賣春」研討會由於並未強調「學術性」，反而更能實際關照婦女的需求和困境，會後（1986 年）在廖碧英主持下，長老教會成立了彩虹專案，救助不幸女子，並於 1987 年和婦女新知聯合發起「反對販賣人口」的大規模行動，引起舉國重視，而有警方的「正風專案」和「婦女救援會」的成立等後續發展。

臺灣大學和東吳大學的會議開啟了國內婦女研究的風氣，但是由於二者皆以國家發展為導向，著重於陳述婦女對國家發展的貢獻，並且強調研究的學術性，因此使得絕大多數的論文無論在理論、方法或視野上無法跳脫傳統學域的框架，發揮女性主義的批判和創新精神。以前者為例，17 篇會議論文中，有 10 篇是當時社會科學界盛行的高結構性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3 篇是以問卷為主，輔以觀察、訪談、座談，1 篇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式

④ 婦女研究早期的英文名稱有不同說法，如 woman study, women studies, women's research 等等，至八〇年代中期，women's studies 才普遍被採用。

研究，1 篇總論式的報告 (survey paper)，1 篇心得報告 (position paper)。除了後二篇之外，其他各篇皆在傳統學科之內，採用客觀中立的態度，以婦女或婦女問題為研究對象，而當時所謂中性的立場，實際上是缺乏女性觀點或女性主體意識的，以致即使在量化被研究者的個人資料時，也是完全以父親或家長的教育程度及（或）職業地位為測量標準（《婦女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1985: 23; 95; 398）。在理論方面，多篇論文一方面抗拒女性主義分析架構，一方面卻又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顯得含混模糊，甚至複製父權心態。例如，有研究者因本身設計的問卷語意不清，以致出現受訪者半數以上贊成「女性運動」的統計結果，研究者除了解釋為受訪者誤解題意外，並趁機貶抑婦運，稱美國婦運者「概念不清、用辭不當，動不動就說『婦女是被剝削的一群』……婦女解放者的批評和建議，是過激主義者和急進主義者……」，而「反觀我國自己，亦早已不適合『新女性運動』。眾多婦女問題，透過婦女會、媽媽之家、生命線、張老師、民眾服務社、〈我愛紅娘〉節目，都能給予適當的解決。」（同上：578–579）另一位論文宣讀者則根本輕視婦女研究，他公然批評：整個研討會「好像一個 women study 的討論會，所以扯得上跟婦女有關的研究就擺進去……。」（同上：221）這樣的心態在以後數年間相當主導了臺灣的婦研界。

八〇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社會逐漸邁向自由開放，婦運團體活動力大增，然而學界和媒體對女性主義仍保持相當戒心，乃傾向於以「兩性研究」或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來模糊化婦女研究的立場。女性主義和非 / 反女性主義的研究立場首次於 1987 年在中國論壇主辦的「女性知識份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上交鋒。當時我受邀發表論文〈女性意識與婦女運動的發展〉，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臺灣婦運的發展脈絡，在場的諸多女性學者相當不以為然，反對的意見包括：一、臺灣並沒有所謂的婦女運動，因為本地婦女不需要婦運，也不接受婦運，理由是《憲法》早已經給予兩性平等的保障；二、女性可經由參加各種社運團體來推動社會改革，沒有必要另組婦運團體；三、婦女應當透過社會服務的方式來贏取社會敬重，而不應採取抗爭的手段。她們一方面質疑婦女新知對抗父權的策略和可能發揮的社

會影響力，另方面肯定當時甚受媒體青睞的「新環境主婦聯盟」的作法，因為該團體附屬於環保團體新環境基金會，男女會員兼收，而且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並非謀求女性權利。⑤

八〇年代臺灣社會科學界的守門人多半是六〇、七〇年代留美的男性學者，習於傳統學術領域的區隔以及科學、量化的研究方法，而學術界也一向看重師生、輩份等層級關係，在此學術氣氛之下，採取女性主義立場作研究不僅挑戰了傳統的知識論、方法論以及學術理論，也難以見容於既有的父權秩序，因此女性主義研究者必須克服身為女性和身為女性主義者的雙重障礙：無論是尋求論文發表、經費支援或開課。在大型的學術會議中，少有女性的聲音，即使有，也往往淪為點綴性質。以 1989 年由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資料研究中心舉辦的「民間國建會」為例，在整個文化倫理組中僅有清大教授陳若璋一位女性受邀，報告〈從臺灣婚姻暴力面貌談兩性、家庭倫理關係的再檢討〉，孰料她的講評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其南（中國家庭與親屬專家）在評論時，竟然話鋒一轉，以「民間國建會大費功夫集合學者專家，本意在研討『國家建設』大題，相形之下，論文『打老婆』這個問題就顯得『婆婆媽媽』……」，因此他擅自將該時段挪用為批評臺灣的學術界缺乏反省，特別是國科會傑出人才獎頒發不當，當場竟亦無人對陳的漠視性別權力結構的言論提出異議（《聯合報》，1989,12,24）。

不論如何，八〇年代後期的臺灣婦研界仍然出現不少轉機，除了國外婦女研究的繼續茁壯濡沫了本地婦研之外，國外學者如 Peggy McIntosh、周顏玲及陳幼石等的相繼來訪都有助於本地學者接受女性主義。McIntosh 在 1986 至 1992 年間曾數度來臺，做過幾次公開演講，⑥ 肯定婦研為婦運之延伸，西方知名學者的言論顯然比本地「運動者」更具說服力。⑦ 陳幼石則於 1989 年獨力創辦了《女性人》雜誌，其中有相當篇幅介紹女性主

⑤ 作者個人筆記，1987,2,21。

⑥ 在臺北的二場公開演講：1989,4,8 在國立編譯館；1992,2,12 在清大月涵堂。

⑦ 部分婦研者刻意區分學者和運動者 (activist)，後者又被稱為女性主義者，參閱下節有關婦研之辯論。這樣的區分往往帶有排斥的意味，類似的狀況在國外婦研界亦存在，在網際網路婦研討論群 WMST-L 上經常可以讀到。

義重要著作，如 Margery Wolf 的《暫緩革命》(*Revolution Postponed*)（第 1、4 期）， Gilligan 的《不同的話音》(*In a Different Voice*)（第 1、2、3 期）等等。而年輕的女性主義學者如張小虹、丁乃非等人的陸續學成歸國也為婦運和婦研增添了新的視野和行動力。

1988 年婦女研究室與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在教育部贊助下合辦了一場「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雖仍是以學科內的量化研究為主，而且強調學術「中立、客觀而且理性」（《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 1989: iv），卻已微露曙光，周顏玲在專題演講中直接主張抵制西方以男性為學術中心的知識偏見、壟斷和控制：

> 婦女社會學是，企圖暴露西方學術上對婦女認識的偏見和排斥，與帶有「男尊女卑」之封建傳統觀念，其大部分是用男性之價值觀念，來對婦女有關的資料進行分析。為發展中國婦女學或性別研究，必先提高社會學的學術地位，糾正男權制度下對婦女的成見與其被視為次等的價值觀念。小心批判隱藏在西方社會學理論背後的假設、前提及觀點 ……（同上：26）婦女研究者早已指出「統計」知識，是優勢團體對弱勢團體之壓迫工具……重視質之研究是在女性學術開端過程之必要階段。待婦女及性別研究在多方面之實質特徵上有所發現，數量之研究可擴大實質研究之廣泛性。（同上：35）

部分論文宣讀者雖未標榜女性女義，卻表現出女性主義極為重視的自省精神，例如余玉眉在結論中指出：「我常會問我自己，到底我們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如果研究者只是為研究而研究的話，那麼研究者又極容易患上剝削研究對象之嫌……一直期待著，我們對婦女健康的研究是對被我們研究的對象有所幫助。」當她參與設立了「兒童癌症基金會」，她自認獲得了一個滿意的經驗，換言之，她以實踐造成社會改變，與女性主義的主張若合符節。在方法上，她也有鑑於計量之不足，而試圖推展「人本主義層面的」質的研究，並由臨床經驗體會到科際整合的必要（同上：271–279）。林忠正不僅在論文中承認「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臺灣非常嚴重，」並且「至少可以顯示性別歧視在臺灣的勞動市場的假說不能加以摒

棄。」（同上：222）

接著幾年婦女研究會議不僅數目增加，主辦單位也趨於多元化，顯示婦研的學術市場擴大（見表 1）。此外，在許多其他的學術會議中，亦會多少安排一些與女性相關的議題，如前述的民間國建會，清大於 1988 年舉辦的「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及臺大經濟系 1989 年的「臺灣勞動市場研討會」等。不過婦研定義和理念依舊處於混沌狀態。

表 1　1985–1992 研討會一覽表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主辦／協辦單位	地點
1985,3,14–16	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	臺大人口中心	臺北
1985,9,9–10	亞洲婦女之未來研討會	東吳大學	臺北
1985,11,18–22	觀光與賣春研討會	長老教會	臺北
1987,2,21–22	女性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	中國論壇	臺北
1989,7,14–16	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大婦研室、清大社人所	臺北
1989,3,4–6	當今婦女角色與定位研討會	臺北崇她三社	臺北
1989,4,9	性別、權力、正義——文學中的女性／女性的文學	第 13 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臺中
1990,5,26	婦女與健康學術研討會	衛生署、婦研室	臺北
1991,4,19–20	美國婦女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中研院美文所	臺北
1991,6,24–25	兩性與社會研討會	清大兩研室、社人所	新竹
1991,9,26	兩性工作平等研討會	勞委會、婦研室	臺北
1992,2,29	憲法與婦女人權研討會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等	臺北
1992,12,25–27	當代女性文學研討會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時報公司	臺北

(二)婦女或兩性研究機構

七〇和八〇年代美國亞洲協會對於臺灣婦運極盡提攜之力，⑧ 當時亞

⑧ 第一波婦運中，呂秀蓮主辦的各種活動和訪美行程都得到亞協的大力贊助，其後婦女新知的婦女參政年和各地協會的成立，亞協都予以支持，1985 年在「婦女在國家發

協駐臺代表謝孝同 (Sheldon Severinghaus) 並親自介紹婦女新知創辦人李元貞與姜蘭虹認識，希望雙方能發展出合作關係（李元貞 1991: 7）。

在 1985 年的會議中，姚李恕信 (1985: 675) 曾在論文中正式提出設立婦女研究機構的構想，她表示：「有系統的婦女學研究，只有靠政府的資助才能達到目標。沒有研究資料就無法確知問題、需要之所在。隨之，也就無法謀求解決之方法。所以，我願在此請求政府考慮設立一有關婦女人才訓練與研究婦女學之機構。」她的講評人李元貞（同上：689）也立即予以呼應，希望由政府成立婦女研究中心，「一方面做婦女的學術研究，一方面為婦女做諮詢服務，學術與社會服務配合，對整個臺灣婦女的進步才有基礎。再說亞洲地區中像日本、韓國、菲律賓、紐西蘭等國家都已經有婦女研究中心，而唯獨我國沒有，所以，成立一個婦女研究中心是極為迫切的。」

1.婦女研究室（以下簡稱「婦研室」）

1985 年亞洲婦女會議後，婦女新知代表正式向亞協提出了暫時借用臺大人口研究中心的未用空間設立「婦女研究中心」的建議，⑨ 因為臺大的聲譽及臺北市的地理位置都可使婦女研究中心更易為社會接受。我們共同的夢想是有一天這個中心可以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機構，所以它最初的名稱並未冠上臺大，⑩ 早期的研究員也並非全數來自臺大。

不過既然借用了臺大的空間和聲望，日後婦研室的發展也就走上了學術體制內的路線，婦研室在幾年之內數度修改其宗旨，由 1985 年 10 月較為籠統的「一、提高國內對婦女研究的興趣；二、推動系統化的婦女研究工作；三、國內外婦女資料搜集、整理及交換（陳艾妮 1985: 39）」。至

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之外，亞協也贊助了會議論文集的出版。在許多場合，謝孝同都表示過對臺灣婦運的關切（參閱謝孝同 1985: 4）。

⑨ 當時姜蘭虹為該中心的執行祕書，新知成員在合作期間對該中心的使用情況相當清楚。詳細經過請參閱顧燕翎 (1991: 4–6)、李元貞 (1991: 7–9)。

⑩ 陳艾妮 (1985: 39) 於 1985 年 10 月自婦研室取得的資料顯示：「婦女研究室」的構想其實早已萌芽，不論是關心本地婦女處境的人士，或是從事有關婦女研究的學者，多年來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臺灣地區有一個婦女資料與研究中心，使得大家對本地及世界婦女的現況有更確切的瞭解。多方爭取之下獲得亞洲協會慷慨相助，並借得臺大人口中心一間辦公室才得以正式成立。

1991 年界定為「一、促進並推動學術界對於婦女與兩性方面的研究；二、建立國內外婦女研究學者及機構合作與交流的網路；三、提供國內外婦女研究的諮詢服務；四、發展有關婦女與兩性的教學工作；五、以學術方法推動婦女研究與政策之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參考。」愈來愈肯定其學界內的定位及與官方的關係，而與婦運劃清界線，然而究竟什麼才是婦女研究的「學術」，終於在婦研界爆發激辯，而靠攏主流後，婦研仍難以脫離邊緣位置，將於下節論及。

不論如何，婦研室成立十年以來，仍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在學術資料的流通，婦女研究的推廣方面，如定期出版《婦女研究通訊》、《婦女與兩性學刊》以及補助年輕學者從事研究等等。1990 年該室並出版了《臺灣婦女研究文獻目錄》，1994 年《臺灣婦女與兩性研究學者名錄》，1995 年舉辦「婦女研究十年──婦女人權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我們可以說，婦研室是至今為止臺灣最有規模、工作最有持續性、產量最豐的婦女或兩性研究機構。

如同臺灣其他的婦女或性別研究機構，婦研室雖努力爭取成為大學編制內的單位，至今迄未成功，不過對外一直延用臺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的名稱。在亞協之外，該室曾獲林伯泰、徐元智等基金會的資助，以及仰賴各項研究、會議、出版計劃的補助款項，如國科會對「婦女與健康」大型計劃的支持，衛生署、教育部、勞委會的補助等等。至今婦研室歷任三位召集人，皆是臺大專任的女性教授。

2.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以下簡稱「兩研室」）

清大兩研室於 1989 年亦是在亞協贊助下成立的，是該校人社院的一個單位，並且在成立之初得到人社院補助，卻始終不是學校的正式單位。清大兩研室的宗旨是以「教學與研究並重……在教學方面……以發展出一套系統和完整的婦女研究課程為目的……在研究方面，以促進科際和校際合作來擴展及提昇現有關於婦女、性別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研究為目的。」（「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簡介」1989）由於標榜兩性，而非女性研究，兩研室於 1991 年 6 月舉辦的「兩性與社會研討會」就

頗為刻意呈現中立和中性的立場。⑪ 1993 年在大專院校兩性教育通識課程研討會上，兩研室的宋文里和張維安 (1993:68) 教授在論文中表達了他們的省思：「在這個研究領域裡，男性是相對的不夠被重視的，如果重視也是在相反的一面，兩性的問題，只從女性的觀點，或只從關心女性的觀點是明顯不夠的。『把男性擺回適當的地方』(bring the man back in)，和『把人放回討論的重點』一樣，可能是相當重要的一步。直到目前為止，所謂的兩性研究，男性只作為對照的一面，參與的研究者也以女性學者居多，或以女性為『正統』，男性在那裡？」兩研室的活動範圍除了清大校園之外，於 1995 年進入全球網際網路。

除了非屬校內正式編制，兩研室亦無固定經費，而有賴召集人（每兩年改選一次）籌募。兩研室自 1993 年起執行國科會的大型研究計劃「性別的文化建構」。

3.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兩研中心」）

高醫的兩研中心亦是在亞洲協會資助下創立於 1992 年 9 月，曾經主辦過各種與兩性有關之座談會、工作坊，並於當年獲得內政部「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之優良團體」獎，也曾獲陳啟川基金會贊助。1995 年至 1998 年負責國科會的科際整合大型研究計劃「社會變遷中的性別角色研究」（《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簡介》）。兩研中心亦非校內編制，其主任和總幹事為謝臥龍（高醫）和駱慧文（和春工專）伉儷，自成立以來未曾改選。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劃

自 1992 年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劃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立，結合國內外 6 位學者，選定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為研究

⑪ 研討會包括以下論文：謝小芩：〈性別與教育機會〉，周碧娥：〈從他動到自動〉，王俊秀：〈家庭婦女的環保參與：理論與實際〉，廖炳惠：〈文化交流與情色角逐：以巴托克的《不可思議的中國人》與杜哈絲的《廣島之戀》為例〉，張維安：〈看不見的背景：從生活領域論兩性之不平等〉，盧蕙馨："Women's Self-growth Groups and Empowerment of the 'Uterine Family' in Taiwan"，宋文里：〈穹窿：書寫一個理解的初型〉，呂玉瑕："Women's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aiwan"，徐正光：〈家庭農場的生產與再生產〉。

範圍，其目的在：一、建立長期婦女史研究中心；二、聯絡同好，共同研究。在過去數年內，曾舉辦座談、演講，蒐集研究資料，每年出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刊（呂芳上 1992: 60），並出版中國婦女史研究資料目錄。計劃主持人先後為該所研究員王樹槐及呂芳上。⑫

㈢婦女研究定位與定義之爭議

1987 年之後，婦女研究引發爭議之處為：一、研究方法應否標榜客觀中立；二、婦研與婦運之關係；三、婦女研究之社會定位。此三者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所指涉的其實是相同的一件事，即研究者的自我定位。非女性主義者主張因襲實證研究傳統，採取客觀中立的態度和方法，同時也認為婦研與婦運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婦研為「純粹的」學術研究，至於什麼是學術，其標準為何，則是先於婦研存在，不容置疑，她們否認婦研機構為婦女團體，而強調其「學術」屬性。持相對觀點者則為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者，主張婦女研究不僅為婦運的歷史產物，也是婦運的延伸，婦研、婦運與女性主義三者血肉相連，不可或分，因為婦研（或女性學）有歷史、有立場、有目標，而其他任何研究者在選擇研究主題、擬定問題、以及尋求答案的過程中，亦涉及個人的學術背景、品味、思想信仰以及當時的學術流行，所以在性別議題上標榜客觀中立者，只不過在掩飾其性別盲點，以及符合或附和主流的立場，女性主義者並主張婦女研究者應回饋婦運，不應自外於婦女團體。至於婦女研究是否應僅由婦女來做，並未引起太多公開爭論，只是有男性加入或希望男性加入的團體往往採用兩性研究的名稱。

1985 年婦女研究引進國內之初，甚受社會科學學者歡迎，因為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新領域，所以 1986 至 1989 年之間發表的文獻有 580 則，比起 1982 至 1985 年間的 381 則超過 50%以上。然而在以婦女為研究對象以及學術資源之時，許多學者卻不願承認婦女研究的根源在婦女運動，也對女性主義的學術價值存疑。除了前節所述之事例外，姜蘭虹與周碧娥在清大的「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1988: 6) 上表示：「由於研究者傾向於以客觀且中立的態度討論婦女角色，其形式較易被接受。在此起步

⑫ 詳見本期游鑑明文。

階段，很值得政府單位經費支持。臺灣婦女研究的範圍，尚未有很清楚的界定，而且在現階段未表現強烈的女性意識或兩性意識的特色……。」她們將婦研從婦運抽離：「使得女性不平等的討論，不再停留在情緒化的爭執，而能進一步以客觀的態度和嚴謹的研究來深入深討其成因，作為提出改革措施的基礎。」（同上：13）而嚴謹的研究則是：「分析性和高層次實證資料統計處理的『硬性』學術論文，而且其研究內涵也由以往單純地將性別當做一個分析變項來處理，進而將性別 (gender) 當做一個主題來討論，對以往忽視的兩性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做分析和研究。」（周碧娥 1987: 18）

婦女或兩性研究機構雖位居學界邊緣位置，卻遠比女性學者個人更易近用學術、政府及媒體資源，所以在婦研機構占有位置的研究者比較願意與既存權力機構保持良好關係，也在意於維護個人形象而不願挑戰父權秩序，而她們卻擁有較大的婦女研究定義權。因此，挑起爭論、表示不滿的必然是婦女研究界的異議份子——女性主義學者，她們主張婦研與婦運是理論與實踐的一體兩面，不可或分。然而在她們的挑戰形成輿論壓力之前，主流婦研者並未在意，也未予回應，而僅視為偶發性的獨白或討論。⑬

1989 年臺北崇她三社主辦的「當今婦女角色與定位研討會」上，李元貞在論文〈從婦女組織的功能論婦女的社會參與〉中，公開指名婦女研究室應放棄「客觀中立」的婦女研究態度：

> 至於臺大婦女研究室，因附屬於人口中心之下，不敢開放地發展婦女研究。希望她在三年來社會立足已穩的情形下，放棄「客觀中立」的婦女研究態度，才符合全球婦女研究性別研究的思潮，帶給學界新的刺激與功能，不要緊抱著已顯不足的實證研究（計量）的理論與方法，造成優勢團體對弱勢團體方便壓迫的現象。因為歐美的婦女研究，不止跨入性別研究，也在結合種族、階級之研究，來建

⑬ 遲至 1991 年 11 月，《婦女研究通訊》主編胡幼慧方在「編者的話」中表示：最近，論壇內出現有關於本土婦女運動者對婦女研究範疇與變遷之議。事實上，長久以來婦研界內亦有「偶發性」之獨白或討論，不過卻一直未成為研究者間之「關鍵性」議題。因此，藉此難得時機，研究室不但特將此議題擬為本季座談會的主要內容，並亦列為下期通訊專題的主題……。

> 立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而且對所謂科學的「客觀性」提出懷疑與批評，主張採用主體——客體交叉思考與辯論方法，雖目前尚在拓荒階段，但其所帶出的女性主體的思考角度，已對男性為主的傳統學術領域形成刺激與挑戰，增進學術領域的新見解。若非如此，婦研室如何建立系統化的婦女研究？又如何對政府提出有用的婦女政策？

婦研與婦運的關聯，以及婦研應否採取女性主義立場是另一個爭論焦點。清大兩研室於 1991 年 6 月的「兩性與社會研討會」中，安排了一場「臺灣婦運團體與女性（主義）研究」座談會，婦運團體原本期望以主體身份與婦研團體就各自的自我定位以及對婦研的看法進行對話，卻不料臨時被抽換主題及參與名單，而形成一場沒有焦點的各說各話（參閱顧燕翎 1991: 6）。同年 7 月高雄醫學院所辦的「一九九一年現代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學術研討會」中，有一場「婦女與兩性研究——昨日、今日、明日」專題介紹，特別請婦研室張玨主持，婦研室姜蘭虹及清大兩研室周碧娥等主講，李元貞則自費南下，坐在觀眾席。根據《民眾日報》(1991, 7, 7)，「張玨強調參與婦女研究，必須重視對人的尊重，並認清何謂婦女運動，何謂婦女研究，何謂女性意識。姜蘭虹則認為婦女研究應多與國際學者及國內學術團體結合，以提升學術研究的品質。周碧娥介紹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今後的重點工作是性問題的探討。」李元貞除了指責姜、周二人有意抹除婦女新知對臺灣婦運與婦研的貢獻外，並指出：「必先有社會上的男女不平等，才產生婦女運動，促成婦女研究的風氣。臺灣的婦女研究要關心社會背景，否則，所謂的學術研究，很可能走進象牙塔。」姜的回答是：「她不願意被強迫接受所謂的『新女性主義』，婦女問題不能怪罪男性架構，研究工作力求客觀，也關心社會，希望做個社會人，不是守在象牙塔裡。」周則強調，她的研究理念不標榜任何主義，也不自認是某一知識的霸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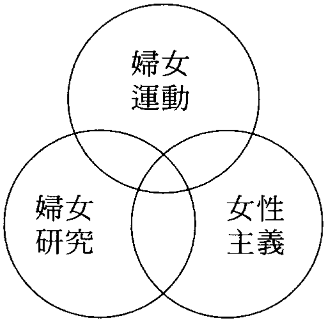
臺灣婦女研究的模糊曖昧面貌於 1991 年 8 月再受挑戰，當月的《婦女新知》雜誌刊出了 3 篇檢討本地婦研的文章：黃淑玲 (2–3) 的〈狸貓換太子——婦女研究在臺灣〉，指婦研、婦運與女性主義三者骨肉髓的關

係，被刻意區隔、漠視，一些零星的論文、課程、研究計劃張冠李戴，美其名成了婦女研究；顧燕翎 (4–6) 的「羊頭如何變狗肉——婦女研究在臺灣的昨日、今日」，細陳婦研如何被一再漂白、澄清，變得附從主流學術的過程，並提出研究婦女並不等同婦女研究，要求婦研者誠懇面對自己的立場；以及李元貞 (7–9) 的「一個憤怒與憂傷的心路歷程——臺灣婦運與婦女研究」，痛斥婦研界排斥婦運，假學術之名信口胡說，不但擱淺了婦研，而且扯婦運後腿，使男性宰制女性的力量繼續強大。她呼籲婦研與婦運合作，共同為臺灣的婦女解決問題。這三篇文章後來被《民眾日報》及《自立早報》轉載，引起學術界的議論，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徐正光 (1991, 9, 2) 並在《民眾日報》為文回應，呼籲婦運、婦研雙方「攜手並進」，因為二者關係可以有兩種：「第一種是將兩者視為運動的不同形式，作為婦運一環的學術研究在凸顯女性的主體性，以旗幟鮮明的觀點和方法揭露權力宰制關係的根源，為運動提供理論的基礎和實踐的策略。」「但是婦運和婦研的關係也可以是平行的，各自為政的，兩者在許多方面可以沒有相關，但並不妨害其具備相輔相成的作用。」

婦研的定位問題顯然在當時困擾著婦女研究者，11 月 29 日婦研室召集了一場名為「婦女研究、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之範疇與變遷」討論會，要求與會者自我定位，會議的發言代表性地呈現出當時頗為混淆的理念，一位學者說：「女性主義並不等於女權運動，因為時代背景的因素，許多人誤解女性主義。現今婦女運動之手段，應有所改變，所走保護弱小手段是否妥當？應該將婦女運動的理念提升，不僅女性認同，男性也要認同，不然又是事倍功半。此外，在改革的過程中應考慮現階段的需求相配合；不要過於突顯『我是女人』的地位分際，以免造成男女兩性對立的關係；應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公平競爭……。」⑭ 張珏則以三個部分交集的圓圈來代表婦研、婦運、女性主義的關係（見下圖），三者可以部分相交，亦「可全不相交。一位與會者誠實地表達了自我定位與社會定位之間的矛盾：她曾與國中男、女教師談教育體系中性別意識的問題，結果有位女教師表示，他們本想了解如何發展和諧男女關係，「而對我所提出的男女教育機

⑭ 會議紀錄中未列發言者姓名。

會不平等的論點表示太激烈了，讓我覺得自己倒變成個婦女運動者。」另一位研究者則自我期許，婦研為體制內之運動，藉個人學術地位推動「不入流的研究教學」，一方面固然阻力不小，另一方面仍形成一股力量。（《婦女研究通訊》26/27 期: 12–20)



亞協當時的駐臺代表高懿德女士 (Edith S. Coliver) 極度關切婦女團體間之爭議，建議不同立場者對談。於是婦女新知主辦，亞協協辦，舉行了一場「婦女研究在臺灣的定位」的座談會 (1991,12,22)，討論婦女研究的定義、在臺灣學術界的位置及物質基礎以及社會關係。座談會主持人為成露茜，引言人我、黃毓秀、丁乃非（婦女新知），張珏、胡幼慧（婦研室正、副召集人）及謝小芩（清大兩研室召集人）。

在婦女新知方面，我先談婦研衍生於婦運之歷史，二者之相關性，國外曾有過的傳統領域之內發展婦研和建立婦研為獨立自主領域之辯，以及婦研所特別強調的研究者之間，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互為主體」的研究方法及「分享與尊重」的倫理。黃毓秀談臺灣學術界的兩個現象：一、婦女研究受到其他領域的侵蝕，如前述陳其南事件等，女性婦女研究者共同處在一個屈辱、不受重視的地位。二、臺灣婦研者走離女性主義、和婦運劃清界線的獨特現象，她歸因於：1.婦研由西方移植過來，和歷史、社會的因素被刪除，以致產生疏離；2.婦研者分散在各學科，獨自面對男尊女卑文化下男性所控制的文化圈而自我壓抑對男性中心觀的批判，以致呈現出混亂的觀念，甚至以傳統觀點來研究女性。這種「忙著認父兄，卻嫌棄母（女性主義）姊（婦運）」的作法是認知上和策略上雙重錯誤，因為

「如果婦研不能呈現女性的真實處境，不能傳達女性的真實聲音，婦女研究做為一門學域，就沒有自己的根柢、沒有力量、沒有影響力，也得不到尊重。」她主張婦研者除了需個別努力，尚需互相支援。丁乃非則說明，主人的工具不可用來拆解主人的房子。她以違建來比喻婦女研究，婦研好比大樓（男性學術體系）旁的違建，是一個不被注意的，女人偷偷活動的空間，她們以情慾為活動的基礎，把大房子裡的廢物偷運、挪用，變成婦研的武器。她們研究婦女如何被區隔，或如何因為區隔機制而產生不同運作，由誰主導等等。她主張重讀、重寫、重建主流論述，填補遺漏，發出女聲，違建之間應有關聯性、對話和共謀；至於婦研與男性的關係，她主張男人必須看到違建，進而認同女人，愛女人，變成女人。

張玨認為婦女研究包含三個類別：以婦女為研究對象 (about women)；為婦女做研究 (for women)，如研究家庭暴力、被虐婦女；用女性眼光做研究 (with women)。至於在方法和理論上，她主張既有理論和新理論並用，而不必然採用女性主義理論。她再提出上述的三個圓圈理論，她指出，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婦運的後盾，實務工作者和婦研者也可以相輔相成。胡幼慧從婦研在社會學的問題切入，社會問題被交由女性承擔，卻甚少以女性觀點去看問題，在《中國社會刊》的 1,000 篇文章中，只有 10 篇是以婦女為主題，卻不談婦女的福利和地位，經濟學和人口學的情況更差。在個別學術領域內，婦女研究和兩性研究一直居於弱勢，深受挫折，所以她主張跳出傳統領域，集中人力做點事，如合力推動開課，建立合作網路，「以免和老前輩鬥得死去活來。」不過當前婦研的困境是：一、因為社會需求大，所以工作負荷過重；二、社會科學界山頭林立，隔行如隔山，難以跨越，科際整合困難；三、資源取得不易，質的研究不被國科會接受，少有婦研者進入決策核心；所以她主張以民間力量成立方法學的工作坊，自力研究；婦研者互通資訊；並且培養新生代，開發國際資源。謝小芩提出的策略為：一、進入主流學術圈，並伺機加以轉化，例如在主流課程中加入女性觀點；二、在主流之外建立據點。她認為，在不同的戰略位置應有不同策略，不過並未詳加分析，僅約略提及，婦研者可以用分別

扮演黑臉、白臉的方式去「大房子」裡「騙取」資源。⑮

不斷的對話雖未能立即建立共識，至少刺激了多元化的思考和溝通，此後婦研室開闢了以「本土婦女運動面面觀」及「婦女研究之本土化」為主題的系列午間座談（胡幼慧 1992a: 1)，表現出極大的反省能力。胡幼慧 (1992b: 7) 亦在《婦女研究通訊》25 期中表示：「誠如婦運界的評擊，國內社會科學的發展不乏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然而由於這些研究缺乏以女性經驗出發的理論及以女性福祉之提昇為目標，因此淪為『父權控制』『壓迫女性』的學術工具，故不應被視為婦女研究。」不過她也語重心長地提醒：「以『婦女心聲』『女性福祉』為重心的婦女研究，應不是打倒傳統研究，而是在檢視修正傳統脫節、矛盾之處……。」然而臺灣的女性主義者建構婦女研究的目的，亦是在矯正性別盲點，至今尚無人在策略上主張打倒傳統研究。

在多次座談會中，許多婦研者對於自我定位仍感到游移與困惑，一方面意識到既有理論與方法之不足與侷限，另一方面又苦無出路，以致一再重複同樣的問題和答案。在第六次座談會中，引言人謝臥龍提出：「婦女研究、婦女運動、婦女主義要如何結合？個人認為是三個變形蟲，不是三個重疊的圓。有人著力研究方面，有人較執著實務工作，也許都有不同的看法，若能結合的話，將是未來婦女研究的展望。」數位回應人則坦承，想要跨越婦研和婦運 / 實務工作的鴻溝，以及「接觸問題的中心或聆聽少數者心聲」都很困難，因為難以取得對方信任；也有人認為婦女研究已由量化走向質化；最後一位回應者則仍然無法跳出「中性」觀點的泥沼，把問題兜回原點：「談到未來的研究方向，因為有時過分強調女性遭到不平等的待遇，男性也許會覺得妳們已經很女權高漲了，怎麼還能這樣子呢？與其從教育的觀點或從婦女的觀點不如以人的角度（觀點）來從事研究……。」(《婦女研究通訊》29 期: 13–25)

---

⑮ 作者筆記，1991,12,22。

五、第三波婦運(1993-)

九〇年代以後女性學在國際學術界聲勢日增，本地婦運團體也不斷出擊，創造了諸多全國性的政治議題，如雛妓問題、婦女工作權、參政權、兩性平等教育、家內平權等等（梁雙蓮、顧燕翎 1995: 126），一方面催生了更多研討會，1993 至 1995 年間總共 22 場研討會中，有 5 場是完全針對婦女工作權的；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新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東海大學中文系在 1995 年一年之內便舉辦了為期五天的研習會「婦女與文學研討會」（8 月），以及二天的「婦女文學學術會議」（12 月）。1993 年姜蘭虹在《婦女研究通訊》(30: 2–4) 公開承認，婦女運動影響了國外的地理研究。她非但不再避諱使用「父權的壓迫」等女性主義概念，甚至推崇女性主義「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主客關係，以及地理學所強調的科學中立價值取向提出挑戰。」這種轉變反映了世界婦運所導致的學術市場的轉向，此後該刊的「婦訊論壇」也陸續出現了敏銳的女性主義論述。1993 年 9 月 28 日「女性學學會」在臺北成立，更標誌著臺灣婦運的里程碑：理論與實踐、婦運與婦研的結合。1995 年陸續有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及中央大學英文系「性 / 別研究室」相繼設立，不僅從事特定角度的性別研究，而且兼具社會運動精神。

(一)婦女或兩性研究機構

1.女性學學會（以下簡稱女學會）

當婦女研究仍因分析觀點纏辯不休時，婦女新知於 1990 年成立了女性學研究中心，以提供女性主義論述場域，然而即使在新知內部，仍為了定名為女性學或兩性研究而歷經冗長辯論，⑯ 1993 年，為了吸收更多女

⑯ 婦女新知基金會設立研究中心之前，曾就日本採用的女性學，中國大陸的婦女學，以及兩性學、兩性研究等名稱評估討論，為了減低內外阻力而採用兩性學，但在第一次公開活動中即遭到質疑，特別是周顏玲教授提出反對意見。新知董監事會議隨即討論此事，反對改名者的理由：一、婦運長程目標是兩性合作，而且女性研究將觸發男

性學者參加，拓展更大的運作空間，改組為獨立之「女性學學會」，其宗旨為：一、建立女性學研究者彼此之間情感與資訊的支援網絡；二、發展校園婦女運動；三、積極尋求對社會議題的發言空間，落實臺灣婦女權益之保障（張小虹 1995: 10）。這是臺灣第一個自我定位在婦女運動的婦研團體，會員有 60 餘人，第一任理事長為臺大外文系副教授張小虹。

女學會在 1994 年的工作重點為「軍護課程改革」與「校園反性騷擾運動」，透過媒體文宣、立法院公聽會、校園巡迴講座、抗議遊行等形式，批判軍護課程複製和傳播刻板性別角色，要求修改課程內容，由必修改為選修；並且揭發大學校園的性騷擾事件，震撼學界； 1995 年則以編撰《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為重點，分別從法律、社會福利、醫療、參政、工作、教育、性暴力等方面，深入分析臺灣婦女現況，並舉辦研討會。自成立以後，女學會突破了過去婦研學者視街頭為禁忌的心態，表現出相當大的動員與行動能力。其核心成員善用其學術地位所帶來的良好媒體關係，經常接受訪問，幾乎所有的活動也都得到媒體報導，比其他婦運團體享受較大的媒體優勢。為了保持其活動力和減少活動成本，女學會選擇不附著於其他機構、不向政府登記、不設固定辦公室的機動性作法，經費來源主要依賴小額會費。

2.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由城鄉所女生的「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發展而來，以空間為出發點來探討性別在空間環境中所存在的面向，其宗旨為「打造無性別歧視」的城市：為改造一個能看見女人、研究女人及重視女性

性自省，兩性學標示了未來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二、不應以少數、未經抽樣和統計的個人意見抹煞社會可能反應；三、女性學的排他性可能引起強烈反感，不若兩性學具有號召力。主張改名者認為：一、女性學 / 婦女學貼切反映現階段研究內容和需要；二、以女性意識發展的階段理論來看，女性學正是女性中心期的重要內容，雖然超越性別界限的合作是未來目標，但抗議期陣痛難免，女性中心期的辛苦築基工作亦屬必要，否則兩性只能在現存的男性文化架構之內合作，兩性學也只不過在傳統研究中投入性別變項而已。在眾聲之中，王瑞香引用了陳幼石的名言：「做狗的時候不要說人話。」發揮了一針見血的功效。最後雖授權該中心負責人決定名稱，但仍做了一次意見調查，出席的 17 人中，贊成女性學 13 人，婦女學 3 人，兩性學 1 人（顧燕翎 1990: 19）。

使用者的居住空間而努力。」（《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1995: 1）該室除了每半年出版一期通訊外，也曾支援廣播節目。在不使用學校經費和員額的前提下，該室成為城鄉所內的組織，成員以學生為主，雖然人力充沛，但欠缺持續性，不易規劃長期活動，成員中唯一的老師畢恆達所長自然肩負起該室的行政工作。⑰

3.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性／別研究室在行政上隸屬中大英文系，但對校內師生開放圖書資訊服務，性／別室在思考框架及研究進路上與一般婦研或兩研之不同在於其強調以階級、性別、族群、年齡等「社會差異」結合同性戀等「性」議題為研究焦點，該室已於 1995 年出版《A 片事件與情慾拓荒資料彙編》，並在英文研究所發展出「女性主義與性／別理論核心教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簡介），這是國內至今唯一的此類學程。其成員為文學院教師 7 人，核心成員 3 人：何春蕤、甯應斌（夫妻）、丁乃非，採取共同決策方式，不設召集人，由於核心成員皆與婦運或同性戀運動關係密切，兼具多重身分，故不排除以團體名義為運動連署，經費來源除系所補助外，由成員樂捐，大型會議則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⑱

㈡婦研／兩研會議

1993 年以後，會議數量和主辦單位增加，主題也更為深化和多元化，在學術機構和政府機構之外，政黨也因為開始重視婦女選票而頻頻舉辦婦女研究會議（見表 2）。在各場會議中，女性主義觀點非但不再引起騷動不安，反而愈益普遍。

1995 年 6 月，女學會舉辦「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研討會」，開展了本地婦研積極介入婦運的新作風：一方面針對現階段各項問題加以解析，一方面提出政策建議與規劃：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國家、社會、家庭和兩性關係。白皮書出版以後，女學會並以座談會的方式將其理念推廣至校園、文化界和政府單位（林芳玫 1996: 18）。1995 年 11 月婦女研究室主辦的「婦女研究十年——婦女人權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則勾勒出了婦研界的蛻

⑰ 訪問畢恆達，1996,6,29。

⑱ 訪問何春蕤，1996,6,28。

表 2　1993–1995 研討會一覽表

會 議 時 間	會 議 名 稱	主 辦 / 協 辦 單 位	地點
1993,2,18	中日文化交流婦女教育研討會	北市教育局	臺北
1993,4,28	女性勞工福利研討會	勞委會、勞資關係協進會	臺北
1993,5,1	工作場所性騷擾研討會	勞委會	臺北
1993,5,2	婦女就業與教育訓練研討會	新女性、勞委會、臺大社會系、經濟日報	臺北
1993,5,29	大專院校兩性教育通識課程教學研討會	教育部、婦研室	臺北
1993,6,11	婦女與兩性教育研討會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臺大婦研室	高雄
1993,8,17–18	國際婦女環境教育研討會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臺北
1994,3,8	兩性平等工作權研討會	勞委會、清大社人所、兩研室、臺研室	新竹
1994,4,23	1994 民主進步黨婦女政策研討會	民進黨婦展會	臺北
1994,5,19	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臺大婦研、高醫兩研	高雄
1994,12,9–10	女性與新聞傳播研討會	臺大新研所	臺北
1995,3,6	婦女問題的檢視與前瞻	國民黨婦工會、婦研室	臺北
1995,3,18	婦女休閒研討會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臺北
1995,4,6	婦女角色變遷與兒童福利學術研討會	國民黨婦工會	臺北
1995,4,14	歐美兩性平等工作制度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	中研院歐美所	臺北
1995,4,27	女性人力資源開發與勞動權益保障學術研討會	勞委會、婦工會、現代婦女基金會	臺北
1995,5,11	婦女婚姻家庭的解構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國民黨婦工會	臺北
1995,6,8	婦女健康政策學術研討會	國民黨婦工會、衛生署、婦研室	臺北
1995,6,17	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研討會	女學會	臺北
1995,11,17–18	婦女研究十年——婦女人權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臺大婦研室	臺北
1995,12,16–17	婦女文學學術會議	東海中文系	臺中

變與和解，看在中國大陸學者劉伯紅 (1996: 21) 的眼中，「所有發言者都明顯地帶有女性主義視角。」而且張玨在報告時強調：「並非所有關于婦女 (about women) 的研究都叫婦女研究，若只是現象描述而不帶任何價值判斷，則只是一般研究。而符合婦女研究精神的應有：為婦女而做的研究 (for women)；了解婦女而做的研究 (of women)；和婦女一起探討和探究 (with women)；女性自己從事的研究 (by women)。」（劉伯紅：21）感性的表達方式當場引發了眾多與會者熱情的反應。事後周碧娥 (1996: 11–13) 在婦研通訊紀錄此次會議：

> 婦運和婦女團體的崛起和蓬勃，不但是婦女 / 性別學術研究的泉源也是沃土，學術與運動可以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即使是兩者之間或有相斥責的情形，亦有其互相刺激、批判自省的正面意識。臺灣的婦女運動界的學術研究者和女權運動者終於能夠言和，將會給婦女界的第二個十年帶來一個新的開始和美好的希望。果真如此，婦女 / 性別， 1995 將是一個多麼美好和溫馨的回憶啊！
>
> 不論在學術界和文化體系內，它仍是個弱點，是非主流，甚至不被承認（例如，在眾多學門中，國科會和教育部的學門分類從未有此一個學門即可說明）。要在這樣不友善的環境中，要聲明宣誓自己是女性主義或認同婦女研究，其實是需要相當的勇氣。這幾年，我曾親眼看到並體會到一些年輕學者在這幾年參與這個行列的改變：看著她由避諱認同女權主義到大聲宣示，表明立場……那種感動是如此真實，所謂感同身受莫過於此吧！

六、結語

婦女研究起源於女性在男性知識體系和大傳統之外，追求符合女性經驗的理論、知識論和方法學，這種由下而上建構學術領域，比起傳統領域，如人類學、語言學，起因於政策需要，由上而下的發展過程，無論在學術或權力資源的分享上，都必然屈居劣勢。不過不論是起於學院之內的美國婦研，或學院之外的西歐婦研，都起於婦運，且有強大的婦運為後盾，婦

運經驗的累積和衝擊，奠定了女性主義論述的基礎。婦女研究移植到臺灣時，相當受到外國機構的扶持，當時本地婦運仍處於艱困的開創時期，無法提供婦研充沛的社會資源，而婦研、婦運、女性主義血脈相連的歷史並不存於本地社會脈絡，以致許多研究者在擁抱婦研之際仍對女性主義的學術正當性、女性的研究主體、行動和研究的關聯感到懷疑， 1985 至 1992 年之間的幾次公開論辯雖以婦女新知和婦女研究室為代表，實際參與者有臺北、中壢、新竹、高雄等地至少 7 所以上大學婦研任教者，其他人士則選擇保持沉默；甚至在婦女新知內部，「兩性研究」和「女性研究」的命名也曾形成認知和策略上的難以取捨，至 1993 年以後，有關婦研的政治位置和政治用途的見解才逐漸浮現共識。對本地婦研者而言，這是一段艱難的奮鬥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自己，寫下歷史。

然而不論是否與婦運劃清界線，在本地學術體系中，婦女研究做為一個自主的學術領域一貫未受認可──所有大學內的研究室都非屬建制之內，沒有固定經費和編制內人員，甚至沒有自己的空間，僅依靠申請計劃維持；國內林立的大學中沒有一個設立婦研系所；國科會和教育部的眾多的學門分類中亦不設婦女或兩性研究學門，當然也因此不分配獨立的經費。在如此薄弱的物質基礎上，各婦研 / 兩研機構以出版和舉辦會議等方式來籌募經費，開拓論述和運動空間，站在邊緣的（各研究室）和體制外的（女學會）位置保持自主性、機動性和活力，然而這些表面上活動頻繁、生產力旺盛的團體實際上卻時時面臨生存的危機。

九〇年代以後在各學術領域中持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者人數日增，以婦研為名的各種學術會議也頗密集，顯示女性議題受到重視，具有吸引媒體注意和瓜分學術、政治資源的潛力，但是學術會議並非常設性機構，風光落幕之後，會議論文雖可做為主辦單位和研究者個人的績效，卻未必落實於社會、文化的重建。跨領域之婦研若繼續以點綴性的功能存在，則其持續生存將充滿了不定和變數，因為婦研所堅持的理念、方法和問題意識，諸如，為求各領域之間的有效溝通，而在文字表達上盡力做到明白易懂；研究者不隱藏自己的信念、行為，以第一人稱在文章中現身，以及「小題」大做等等作法，往往因為不符合某些傳統學域的成規而受到排斥，

所以婦研者個人時有面臨向體制妥協或者放棄學術資源的兩難選擇。此外，壁壘分明的學術利益團體也難以容納既挑戰現有權威又試圖突破學科藩籬的婦研，像女學會所提的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研究計劃就無法獲得國科會任何補助，而必須由各研究者自費研究。跨領域婦研若不能存在，亦將危及傳統學域內的婦女研究者，因為沒有了不斷創新、激進的自主性婦研的支援和對照，學科內的婦研者將越來越難以向學科內的當權者證明自己研究的正當性。

移植之後，如何生根，不被風雨擊倒，如何回饋婦運，將繼續考驗臺灣的婦研者。

參考書目

中華婦女月刊社，1950–，《中華婦女》。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編印，1985–，《婦女研究通訊》（自 1994 年 12 第 33 期開始改名為《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編印，1990，《臺灣婦女研究文獻目錄》。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編印，1990–，《婦女與兩性學刊》。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編印，1994–，《臺灣婦女與兩性研究學者名錄》。

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編印，1989，《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95，《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創刊號。

《民眾日報》，1991，〈婦女運動婦女研究孰輕孰重〉，7 月 7 日。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1976，《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北：傳記文學。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1981，《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商務。

李元貞，1989，〈從婦女組織的功能論婦女的社會參與〉，「當今婦女角色與定位研討會」論文，臺北。

李元貞，1991，〈一個憤怒與憂傷的心路歷程 —— 臺灣婦運與婦女研究〉，《婦女新知》 111: 7–9。

呂芳上，1992，〈婦女相關研究計劃摘要：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劃〉，《婦女研究通訊》 28: 60。

呂秀蓮，1976，《新女性主義》，臺北：拓荒者。

宋文里、張維安，1993，〈男性意識型態的社會文化分析課程的構想與設計〉《「大專院校兩性教育通識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63–75。

林芳玫，1996，〈女學會與「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研討會」：學術與婦運的結合〉，《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36: 18–19。

胡幼慧，1991，〈編者的話〉，《婦女研究通訊》 24: 0。

胡幼慧，1992a，〈編者的話〉，《婦女研究通訊》 25: 1。

胡幼慧，1992b，〈「婦女研究」再研究〉，《婦女研究通訊》 25: 1。

徐正光，1991，〈從批判到反省——也談婦運與婦研的關係〉，《民眾日報》 9 月 2 日。

宮哲兵編，1991，《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臺北：婦女新知。

周顏玲，1988，〈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理論架構、方法及其中國化與未來發展〉，「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臺北。

周碧娥，1986，〈美國婦女機構的描述〉，《婦女研究通訊》 3: 19–23。

周碧娥，1987，〈臺灣婦女研究的一些問題〉，《婦女研究通訊》 8: 18–19。

周碧娥，1996，〈婦女 / 性別，臺灣 /1995〉，《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37: 11–13。

周碧娥、姜蘭虹，1988，〈現階段臺灣婦女運動的經驗〉，「新興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

黃淑玲，1991，〈狸貓換太子——婦女研究在臺灣〉，《婦女新知》 111: 2–3。

梁雙蓮、顧燕翎，1995，〈臺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臺北：時報。

張小虹，1995，〈女性學學會簡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34: 10。

張珏，1992，〈婦研思源〉，《婦女研究通訊》 25: 29。

陳艾妮，1985，〈婦女研究室為婦女研究展開新面貌〉，《婦女與家庭》 40: 39。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印，1985，《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

楊美惠，1975，《婦女問題新論》，臺北：晨鐘。

劉伯紅，1996，〈「婦女研究十年研討會」我思我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37: 21–22。

歐陽子等譯，1972，西蒙波娃原著《第二性》，臺北：志文。

鮑家麟，1972，〈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食貨月刊》1(12): 620–629。

鮑家麟，1979，《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牧童。

《聯合報》，1989，〈陳其南教授「放炮」文化倫理組掀起論戰〉，12 月 24 日。

謝孝同，1985，〈謝代表孝同致辭〉，《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4，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印。

顧燕翎，1986，〈「婦女研究」：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中國論壇》268: 61–64。

顧燕翎，1987，〈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中山社會科學譯粹》2(3): 37–59。

顧燕翎，1990，〈女性學研究中心正名始末〉，《婦女新知》97: 19。

顧燕翎，1991，〈羊頭如何變狗肉——婦女研究在臺灣的昨日、今日〉，《婦女新知》111: 4–6。

Bowles, Gloria and Renate Duelli Klein, eds. 1983.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arding, Sandra. ed. 1987.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inharz, Shr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